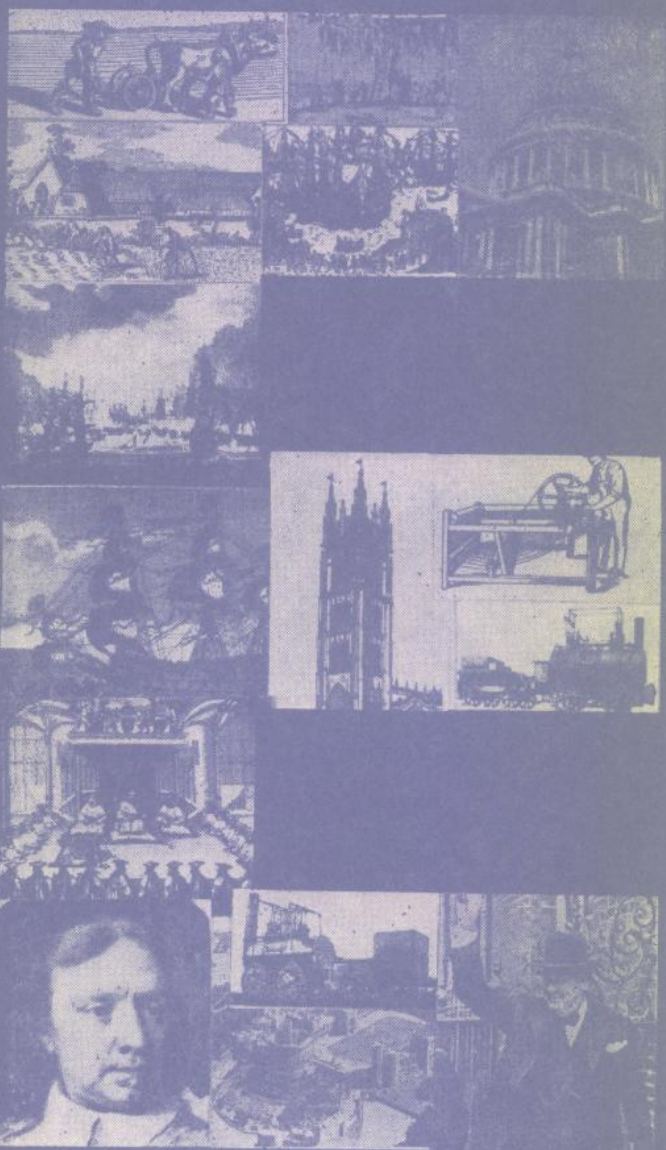


英国史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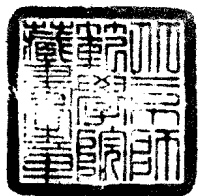
中国英国
史研究会



K561/1

英国史论文集

中国英国史研究会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27213

92 213

封面设计:王师颀

英国史论文集

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75印张 231,000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书号 11002·593 定价 1.00元

前 言

收入这本《英国史论文集》的论文，绝大部分选自1980年在南京举行的中国英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和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论文，少数几篇选自我国的英国史研究者新近的作品。一部分文章已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过。这次收入本文集时，全部文章都经过作者再次修改。文章按历史顺序及专题排列。

这是我们第一次公开出版英国史论文集，很多重要研究课题尚未来得及探讨；在内容和学术水平方面，文集也难免有不足之处，这些，都有待我国的英国史研究者进一步努力。

本文集的编纂贯彻双百方针，所有文章的观点，都是作者本人的见解，不代表本研究会或出版单位。

中国英国史研究会

1982年2月

目 录

英国历史研究动态	南京大学	蒋孟引(1)
七——十三世纪英国农村公社土地制度 的演变.....	中山大学	孔令平(15)
王权还是共和? 保守还是激进? ——试论克伦威尔的政治观	上海师范学院	顾学杰(31)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转折时期的政治斗争 1646—1648年	南京大学	王觉非(52)
试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土地立法的 作用及其影响	上海师范学院	王铁之(82)
论工业革命造成的英国社会结构变化	南京大学	钱乘旦(99)
英国工业发展初期的外国技术	北京师范学院	邵鼎勋(113)
现代英国刊物中对废除谷物法意义 的研究	南开大学	辜燮高(127)
伦敦工人协会和宪章运动	南京大学	沈 汉(152)
十九世纪英国的阶级斗争和议会改革	江西大学	洪永珊(171)
马克思和英国第二次议会改革运动	内蒙古大学	周呈芳(184)
马克思恩格斯论十九世纪中叶后英国 工人运动的衰落.....	南开大学	刘克华(200)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 的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程西筠(216)

两次大战期间英国外交政策与欧洲

- 均势上海师范学院 陶 樾(231)
- 试评丘吉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
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章辉(249)
世界历史研究所
- 论赫斯飞英与丘吉尔“战时内阁”的对
外政策宁夏大学 萨本仁(263)
- 试论博克尔的史学四川大学 谭英华(276)
- 介绍英国历史学家乔·鲁·埃尔顿北京师范学院 戚国淦(292)

英国历史研究动态

南京大学 蒋孟引

这里谈的，限于英国国内英国历史研究的动态。并且一鳞半爪，是极其浮光掠影的。

英国虽已经济衰落，但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的出版，仍继续发展，并且发展得很快。一位外籍华人历史学者在牛津大学得了博士学位，三年后再去，书架上的书籍已大大改观，都是新近出版的，其中包括他的同学的一些著作。我们看到一份打印的《1800年以来的英国社会史》参考书目，共一百零一种，除了很少几篇论文和小册子，都是专门书籍，也没有资料汇编之类的东西。这一百零一种文献中，有八十七种是六十和七十年代出版的，老书很少，杜维廉(G.M. Trevelyan)的《英国社会史》(1942年版)及其插图本四卷(1949—1952年出版)，都没有列入，被精简了。多卷本的历史著述，也都出齐。如克拉克(Sir George Clark)主编的十四卷本《牛津英国史》，最后问世的一卷是《十五世纪》，1961年出版。道格拉斯(D.C. Douglas)主编的《英国历史文件》的最后一本，即第十二卷第二分册(1874—1914年)，1978年出版。

英国史学虽发展很快，但观点方法仍保持传统。本世纪的纳米叶(Namier, 1888—1960年)学派，说是革命，说是英国史学方法的第四代，但塞奇威克(R. Sedgwick)认为它的根本特点，只是运用更广泛更权威的史料来分析和阐明问题而已(《今日史学》，History Today, 1951年元旦创刊，1960年10月)。这仍是传统的

方法。就是比较进步的史学家，也未能摆脱传统的影响。所以当前英国的本国史研究动态，由历史教学、著作、杂志等等方面所反映的，基本上还属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奇的现象。

一 专 题 研 究

专题研究是最基本最普遍的学术活动。英国史学家一般不满足于已出版的著述和史料，还要探索尚未刊印的档案、手稿（日记、书信等）和各种各样的原始文件。从这种原始材料中，找出东西来丰富史实，考订疑案，说明问题。早在1895年，阿克顿（Lord Acton）说：“毕生精力用在很大的已出版的书籍上，不足以训练出一个近代史的真正专家。”应该怎样做呢？他说：“伟大的历史学者，现在必须到厨房里吃饭。”意思是说这样才能看到饭菜的原始状态以及它们如何成为那么好吃的饭菜。不过光是看看就够了吗？不够！三十年代一位经济史家鲍尔（E. Power）教授补充说，“在厨房里吃饭而从不同厨师谈话，就没有好处。”所以不仅要察看材料情况和操作过程，还要对之进行讨论、分析、研究，才能写出有创见的历史，才能对史学长河有点滴的贡献。这是英国史研究的传统，至今不变。

按照这个传统研究历史，要写成一本书不是轻而易举的。但新书仍源源涌现，不过主题较小，范围很有限。如希尔（Dr. Christopher Hill）的《弥尔顿与英国革命》，以及其他人的《公地和圈地》，《伊丽莎白的议会》，《维多利亚的军队在本土》等等。

专题论文，当然更多。一些主要史学期刊，如《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886年创办的季刊），《史学》（History, 历史协会的刊物。每逢2、6、10月出刊），伦敦大学的《历史研究所公报》（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半年刊), 剑桥出版的《史学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 季刊), 前面都有几篇学术水平高的论文, 其内容是繁花杂陈, 争奇斗艳。多数是属于古代的, 如十四世纪一个王后的生年问题, 十至十五世纪的十家连保制(Frankpledge), 按选民册分析五个郡在十八世纪初期的投票情况; 1553—1558年的小册子和政治, 因为这个玛丽(Mary)女王时期, 反对政府的小册子是多而强有力的; 还有科林森(P. Collinson)写的《布道团: 十七世纪英国教会生活的组织和特点》(1975年), 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前二十年间布道团的讲道不同于教会的讲道, 一个布道团少则三或四人, 多则二十人或更多, 一般是十三人, 按年龄、学历等轮流讲道, 他们不是教会人员, 而是世俗布道员, 为自己雇主的利益服务, 违反教会利益, 所以布道团的讲道, 实际是反教会的一种方式, 甚至是革命的一个因素。也有少数论文是研究近代现代问题的, 如《自由党的帝国主义者, 1892—1906年》(著名的有阿斯奎斯 H. H. Asquith, 霍尔丹 R. B. Haldane, 格雷 Sir Edward Grey等), 1906年工党议员是二十九, 五十, 还是五十三人? 1916年报纸与首相阿斯奎斯的下台, 1930年代的难民问题, 《英法与埃塞俄比亚危机, 1935—1936年》。当然, 这些论文的水平, 高低不会一样。还有围绕一个主题的论文集, 如《商业帝国主义》(Business Imperialism, 1977年), 收文十一篇; 《清教徒与革命者》(Puritans and Revolutionaries), 收文十五篇, 是希尔的十五个学生为纪念他的退休而各写一篇编成的。

二 地方史

西蒙斯(Jack Simmons)教授的《英国州郡史家》(1978年)说, 十一世纪就有人写地方史, 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更多, 达格代尔

(Dugdale)的《沃里克郡》，以材料广博和处理得法，首先达到“典型地方史”的水平，所以十七世纪的赖特(Wright)说，沃里克郡产生了两名出色的作家，就是达格代尔和莎士比亚。

但地方史的极盛时期，还在现代。因搜集起来的原始史料越来越多，处理方法也更科学化，便能大写州郡史，城市史，如《伯明翰史》三卷，《伦敦港史》，《伦敦城的长老会，1645—1647年》，《改革时期的伦敦，1725—1848年》(1977年)；也写一个教区史，一个寺院史，一个社团史，甚至一个村庄史。而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如某郡以航海和贸易为生，就写它的航海贸易史，某地煤矿丰富，就写它的煤炭工业发展史。还进行专题研究，如《金上校与林肯郡政治，1642—1646年》，《自由党对自由党：1874年设菲尔德与布莱德福的大选》(两郡是北方大工业区)。现在最庞大的一套地方史丛书，是《维多利亚英国州郡史》(The Victoria History of the Counties of England)，分郡出版，有的郡已出到十多卷，仍在继续中。这套丛书委员会的主席，由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担任。

由于有研究地方史的传统，便有关于地方史的专门刊物，如《爱尔兰历史研究》(Irish Historical Studies，半年刊)，《米德兰历史》(Midland History，半年刊)等等。1975年创刊的《伦敦杂志》(The London Journal，半年刊)，还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研究。当然，所有地方史杂志，都只研究本地区的各种历史，从而使整个英国史日益丰富。正如伦敦大学一位教授在南京说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的经济情况，就不能对这个国家的整个经济情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英国地方史很繁荣，出版品不少，比之我国旧日的方志和现代的“四史”，好象更多样化，更能与时俱进。它是英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越来越发达。

三 帝国主义问题

英国是殖民帝国主义。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却不采用这个定义，而炮制一些五花八门的名词，如第一英帝国（美国独立以前），第二英帝国，无形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商业帝国主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等等。然而按照他们近二十多年的研究，结论还是不能甩掉殖民帝国主义的帽子。

所谓新帝国主义的典型说法，是霍布森（J.A.Hobson, 1858—1940年）的《帝国主义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 1902年）。他认为国内消费有多余，就不得不输出商品，也要输出资本。这是维多利亚晚期帝国主义的根源。但这时商品和资本的输 出，受到德国、美国等的阻碍和排挤，英国乃不得不开辟新的市场。而 要保障和发展这种新市场，最好是建立保护国，甚至实行领土吞 并。这就造成殖民帝国主义的基本因素。例如首相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在1885年断定说：“大国能在中国建立最好的基地，就能掌握世界贸易的最好部分。”

与此相反，有人认为实行殖民是政治野心、国际竞争以及当地复杂情况的结果，而非单纯由于一般的经济力量。这是政治帝国主义的说法，多数人不予同意。他们认为，领土扩张的要求，或早或晚总需要商业的扩张。正如美国穆恩（P.T.Moon）教授说的：“输出商，工厂主，传教士，舰队司令，都与外交官员‘项背相望’。”

前面提过的社会帝国主义，当然不是现在我们通常说的社会帝国主义。近来有些英国学者以为经济的理由不是帝国主义的全部理由，而应该代之以社会的和政治的理由。例如牛津大学菲尔

德豪斯 (D.K.Fieldhouse) 说：“单纯的经济学说的条件和财政资本的性质，不能说明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的成熟形势下，最好描述它是一种扎根于政治事实的社会现象；就是要能恰当地了解它，只有依靠那种曾经激起民族主义更富侵略性的社会歇斯底里。”这个暧昧的说法，对照列宁引用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罗德斯 (C.Rhodes) 的话，就很清楚。罗德斯“常常说，帝国就是饭碗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四十九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帝国主义问题，是当代英国史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主要杂志如《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过去和现在》(Past & Present)，以及其他刊物如《曼彻斯特约翰·鲁兰兹大学图书馆公报》(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of Manchester)，都登过论文。其目的无非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但结果却是欲盖弥彰。

四 自由贸易帝国主义

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主要是指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帝国主义。这是近二十多年来英国历史学者讨论的重大问题之一。

英国由于是“世界工厂”，加上曼彻斯特派的大肆活动，自由贸易成为喧嚣的国策，而扬言反对扩张领土。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 (B.Disraeli) 甚至宣称，“殖民地是挂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石。”然而国内喧嚣如此的时候，在国外仍继续扩张。这种内外矛盾、言行矛盾、说的是一套做的又另是一套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不稀罕，但英国历史学者百般解释，力图自圆其说，从而引起一场历时几十年的辩论。

在1940年出版的《剑桥英帝国史》第二卷中，法伊(C.R.Fay)博士确立了一个术语，“无形帝国”。显然，这是区别于有形帝国的。所谓有形帝国，就是古代的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查理曼帝国，重商主义时代用武力建立的殖民帝国。不同于这些，“无形帝国”只图发展商业，进行自由贸易，就是“贸易而不统治”。果真如此，何必非议，更谈不上帝国或帝国主义了。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所以还有文章可做。1953年，《经济史评论》刊登了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和鲁宾逊(Ronald Robinson)博士的著名论文《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其主要论点有三。

第一，十九世纪的英帝国主义，应该以海外贸易和投资来解释。一个地区或国家如果“接受”英国的这种扩张，英国就不会把它置于自己直接统治之下。这是一般的说法，即自由贸易帝国的政策是“贸易而不统治”。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事实却是：“倘若可能，贸易加无形的控制；一旦需要，便实行贸易加统治。”这个侵略政策，是十九世纪一贯坚决执行的，不管哪党在位，谁人掌权。特别是十九世纪中叶的几十年，英国实行的正是这个“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当时有形帝国表面上似乎要崩溃了，便有人把水搅浑，诡称这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时期。到十九世纪末叶，有形帝国的扩张又很迅猛，便称之为新帝国主义时期。这个变化的根源，只是自由贸易的兴衰。而两个时期的对立，并非历史的真实，乃是历史学者解释的差异。合乎事实的说法应该是：整个十九世纪英帝国的扩张，根本上是有连续性的。

第二，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是英帝国主义的两种方式，同样重要，随时间、地点、条件不同而取舍。在1815—1880年间，英国在海外积聚资本达十一亿八千七百万英镑，其中在有形帝国的没有超过六分之一；1913年，海外投资三十九亿七千五百万英镑，在有形帝国的不到一半；在十九世纪，有形帝国购买英国的输出口，

没有哪一年大大超过三分之一。于此可见无形帝国的重要性。原来帝国主义的政治作用之一，是把新地区结合于扩张的经济范围之内。如果一个新地区不能为贸易的发展提供满意的条件，帝国主义的力量就要去调整这些条件。反之，若满意的政治结构建立起来了，通常的帝国主义干预就会减少，帝国主义的控制也会相应放宽。可以说，这种愿意限制使用最大的力量来为贸易确保安全，乃是十九世纪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显著特色，不同于重商主义时代一味用武力通过政治占领去获得商业的优势和独占。不过由于情况的需要，两者又可并行不悖。例如有形帝国的重商主义手段，在十九世纪中叶用于开发印度；同时为了同样目的，在拉丁美洲却实行无形帝国的自由贸易。所以就整体说，无形帝国和有形帝国同是英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两者的差异不在于根本性质上，而只在于程度上。印度与英国的关系，曾由无形的演变为有形的，成为英国王冠上一颗珍珠；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又退到英国无形帝国中去了。

第三，政治和经济也同样重要，不能偏废。由于工业的发展，对政策提出新的要求，即必须把对外贸易同不发达地区联系起来，就是要用政治的武器，强迫打入为别国所垄断的市场。那种自由贸易无需帝国的说法，是完全不实际的。反之，仅有政治的优势而没有商业的渗透，帝国的扩张也不会巩固，甚至归于失败。所以英国扩张之最普遍的政治手段，是与弱国缔结自由贸易和友好条约，并且这种条约往往是强加于人的。那些保持“经济帝国主义”概念的人，认为十九世纪末叶英国大肆吞并领土，是因自由贸易的衰落和保护海外投资的需要，便斩钉截铁地改变了原来的政策。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海外投资既非新事物，而且仍在源源流入有形帝国以外的地区。十九世纪中叶和晚叶的政策制订者，实际上都不拒绝扩大有形的统治以保护英国的利益，如果无形

的方式已经不能保证的话。这就是说，英国政府为了建立和维持英国的最高地位，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正如前面说过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并非“贸易而不统治”，乃是“倘若可能，贸易加无形的控制；一旦需要，便实行贸易加统治。”所以在1881—1889年间，又给私人公司颁发特许状，授权它们在帝国特许下对新地区进行治理和投放资金。这标志着支持英国贸易扩张的方式由无形到有形的转变。为了扩张，对当地固有的结构施加破坏力量，使之衰落以至瓦解。这种趋势，使英帝国主义的控制从间接的最终变为直接的，成为所谓新帝国主义。

加拉格尔和鲁宾逊的上述论文发表后，引起英国史学家的很大兴趣，有人提出修正的意见，有人竟横加反对。1962年，麦克唐纳(Oliver MacDonagh)教授在《经济史评论》发表题为《自由贸易的反帝国主义》一文，说两位的著名论文虽对帝国主义研究的形式主义和死守宪法有所改正，但又太远地把人们引往相反的方向了。归纳麦克唐纳的意见，也有三点。

第一，“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应该修改，因它没有表明真实的情况。典型的自由贸易论者，如科布登(Cobden)和布赖特(Bright)，既反对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又敏捷地发觉并痛斥一切种类的无形的东西。他们还彻底反对把“自由贸易”同单纯的商务增加混淆起来，同以暴力强迫“开放市场”混淆起来。他们也相当准确地预言了随便干预别国事务的恶果。这些都表明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所以不能把自由贸易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

第二，加拉格尔和鲁宾逊的功绩在于：确定了1845—1860年间英国政策和公众感情的帝国主义本质，清除了与之相反的神话。但当他们走得更远，无视对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反对，否认维多利亚时期英帝国政策的多样化，那就会把人引入歧途。事实上，维多利亚时期，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是纠缠在断断续续的没有完

结的斗争之中。而在历史上,力量以及力量和力量之间的斗争,都是很重要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历史,许多就是这种斗争的历史。

第三,帝国主义力量和反帝国主义力量的斗争,并不是单纯地一对一,而夹杂着一些其他纠纷和矛盾在内。首先,帝国的争端,从来绝不是同国内重大的利害关系和人的偏见隔离的。其次,在各大集团内部,也有严重的意见分歧,例如布赖特因1882年炮击亚力山大里亚而辞去了格莱斯顿政府的职务。当然,外交部的常任官员是一种强大的稳定力量,但不是不可拒绝的。而加拉格尔和鲁宾逊认为,在十九世纪帝国史中,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是主仆关系,未免过分简单化了。复次,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主义,包含几种因素。贸易当然是很重要的,但还要传播基督教,推行沙文主义。例如报纸派遣“本报记者”奔赴战斗现场,用文学笔调描述据说是亲眼见到的屠杀、伤残和痛苦挣扎的实况,绘形绘声,让人们读着开心。所以帝国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常常用了同样的宣传口号:经济利益,宗教原则,民族荣誉。

很显然,麦克唐纳的文章,没有在加拉格尔和鲁宾逊观点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反而后退了。虽然他肯定了两位的一些正确论点,自己又加上了一些合乎实际的说法,但还有不足之处。譬如说自由贸易论者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这纯粹是表面现象,尽管他们高谈阔论,吵吵嚷嚷,帝国主义者仍照旧不断地在搞帝国主义勾当。另一方面,那些当权的帝国主义者,叫嚷的却也是自由贸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正好表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又如说帝国主义因素复杂,固是事实,但哪一项不是为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呢!事情已成历史,解释是不能改变过来的。

然而还有人要想改造历史,并煞有介事地引用官方文件和统计材料作为科学根据。这虽足以把水搅浑,扰乱视听,但终究是通不过的。

1968年，普拉特(Christopher Platt)也在《经济史评论》发表《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若干保留》一文，完全反对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说法。

普拉特公然宣称，英国政府关于海外利益的要求，从来没有越出平等互惠、公开竞争和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范围；为保护受外国损害的英国人民而使用武力，是少见的，例外的，其目的也依然只是促进英国的贸易和投资。这套言者不脸红听者很气愤的说法，纯粹是重复了1841年帕麦斯顿(Palmerston)的官话：“政府的职责，是为商人开辟道路，并保障之。”普拉特还引用了后来克拉伦登(Clarendon)训令驻北京公使告诫各地领事的话：“常常记在心上：海军的干预，要想在事后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追认，只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即事势已很明显，没有这种干预，英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就极有可能遭受牺牲。”他从这些官方文件得出结论说：还有什么可以叫做帝国主义呢？

普拉特更进一步说，不干预和自由放任，是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官场的根本态度，这种态度在海外也是被忠实地反映出来的。举几个例。说英国政府在拉丁美洲的政策是要获得“对这些新地区的间接的政治霸权以利于贸易。”或创造“一个新的无形帝国”以利于将来英国商业的扩张，都是不真实的。也不能说，英国对中国有什么“政治控制”。更不能否认，英国政府不愿干预英国贸易和投资的广大领域，尤其殷切地避免使用武力去促进贸易。所以决不能把这个自由放任、不干预主义的政府的政策描述为“倘若可能，贸易加无形的控制；一旦需要，便实行贸易加统治。”这些话在中国人听来，念其言而忆其行，不仅啼笑皆非，真是创巨痛深！

普拉特还继续诡辩。如果说“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曾经存在，那也限于为均等的国际贸易开辟世界市场。一次行动若偶然以暴力告终，其间也从未要求独占的政治势力、单独控制、新的领土，或